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翻译研究概论

(1978—2018)

许钧 主编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 Opening-up
(1978-2018)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教育出版社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翻译研究概论

(1978—2018)

许 钧 主编

著 者 (以姓氏拼音为序) :

胡安江 胡开宝 蓝红军 刘军平 刘云虹
穆 雷 屈文生 屠国元 王斌华 王传英
王宏印 王克非 许 钧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 (1978—2018) / 许钧主编. —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8.11

ISBN978—7—5564—2621—8

I. ①改… II. ①许… III. ①翻译—研究—中国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46919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 (1978—2018)

出品人	方平	特约策划	唐瑾
责任编辑	刘宁 王艳波	整体设计	牛红
责任印制	张遇春	责任校对	李镞
出版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268号C座18楼 (邮编: 430015)		
电 话	(027) 83619605		
网 址	http://www.huedup.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480千字		
印 张	33.25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564—2621—8		
定 价	128.00元		

本书为



中国翻译研究院重大研究成果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是中国翻译文化事业繁荣昌盛的四十年，是翻译活动日益频繁、不断丰富的四十年，是中国翻译研究不断探索、快速发展的四十年，也是中国翻译学科从无到有、砥砺前行的四十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1978—2018）》一书全面回顾和总结这四十年以来中国翻译研究的探索历程，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本书立足于中国翻译研究的现状和未来趋势，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在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社会实践中中国翻译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作了较为完整和认真的梳理与评述，通过对中国翻译研究发展历程的回顾、所取得的成果的评价，对存在的问题的分析，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把握翻译发展的时代脉搏，确立新时代背景下翻译学的发展路径，为推动中国翻译文化事业、中国翻译教育、中国翻译话语体系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特征	2
第二节 全书撰写构想与内容安排	12
第一章 翻译学学科建设	22
第一节 学科意识的萌芽	23
第二节 学科体制的发展	29
第三节 学科理论的探索	34
第二章 翻译学理论建设	52
第一节 翻译理论体系的建设	53
第二节 翻译理论话语体系建设	79
第三节 中国翻译理论的未来发展	89
第三章 中国传统译论的阐发与研究	96
第一节 中国传统译论的文献整理与研究	98
第二节 中国传统译论的阐释	104
第三节 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前景展望	127
第四章 外国翻译理论的引介与反思	132

第一节	外国翻译理论的译介状况	133
第二节	对外国翻译理论的反思	157
第三节	外国翻译理论的借鉴与融合	171
第五章	翻译史研究	180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翻译史研究概况	181
第二节	翻译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196
第三节	翻译史研究展望	203
第六章	翻译批评研究	211
第一节	翻译批评的理论探索	212
第二节	翻译批评实践与理论的互动	228
第三节	翻译批评的建构力量与新时代翻译批评的责任	239
第七章	中国口译研究的发展、成就和趋向	265
第一节	中国口译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概况	266
第二节	中国口译研究的代表性成就	275
第三节	中国口译研究的发展趋势、特点和展望	286
第八章	中国文学“走出去”与中译外研究	291
第一节	中国文学“走出去”与中译外历程回顾	291
第二节	中国文学“走出去”与中译外研究现状	300
第三节	中国文学“走出去”与中译外未来展望	307
第九章	技术手段与翻译研究	313
第一节	技术手段助力翻译研究	313
第二节	语料库与翻译研究	317
第三节	键盘记录技术、眼动仪与翻译研究	331

第十章 中国的翻译职业发展	342
第一节 中国的翻译职业化发展概况	342
第二节 翻译职业研究的对象与主要研究成果	359
第三节 翻译市场与翻译管理的未来展望	379
第十一章 翻译学术出版	401
第一节 翻译学术出版概述	401
第二节 翻译学术出版的成绩	406
第三节 翻译学术出版与翻译学学科建设	416
第十二章 新时代翻译研究值得思考的问题与探索展望	432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翻译研究值得思考的问题	432
第二节 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与探索重点	443
参考文献	454
术语对照表	480
后 记	524

绪论

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国家宏大而独特的改革开放实践为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在迈进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在这样一个历史语境中，中国翻译学界有必要回顾与检视改革开放4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从中外文化与文明交流、互学互鉴的高度，对中国的翻译事业，尤其是翻译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和存在的不足进行梳理与总结，进而以当前实际为新的起点，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进一步加强翻译学科建设，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翻译学理论，为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做出翻译学应有的贡献。

考察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翻译学发展，可以看到，我们的翻译研究始终贯穿着对学科知识的自主性追求，在回应国家、社会和语言服务行业的发展需求中不断调整学科理念、人才培养观念和翻译实践观念，我们的学术视野与对象领域不断拓展，思维方式与理论话语不断丰富。翻译研究，作为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知识生产活动，不仅受这一时代的历史使命和人文精神的召唤，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向前发展，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引进来、

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实践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促进了国家各方面的建设、国家和民族形象建构，以及对外科技、经济和文化交流，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国家方略的实施提供着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持。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特征

在改革开放的宏大背景下，我国翻译研究从初始开放和借鉴、引介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到强化交流与反思，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学习和探索研究方法，再到关注理论话语建设，注重跨学科综合创新，我们一直致力于翻译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与行业实践的同建共构，不断改善学科环境，发展翻译教育，培养翻译行业人才和学术研究队伍，探索具有自身学术品格的理论体系，走的是一条“开放、探索、互动、创新”的发展之路。

一、以开放的精神，拓展翻译研究领域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译学尚未进入现代译论阶段，翻译理论主要以古典文艺美学、传统哲学为理论根基，以个体经验总结、直觉体悟为基本方法，与外国译学界的交流受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限制，我们对西方译论知之甚少，了解不深，更谈不上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改革开放开始后，和诸多其他领域一样，我国译学的对外学术交流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对外的开放中，拓展新的空间，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机会，研究机构和出版机构陆续恢复或创立，翻译研究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开放之初，我们对外国译论的引介一改唯苏联马首是瞻的做法，引进的译论成果呈现出国别多样化的特点，重点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英美国家得以发展的语言学翻译理论。奈达、纽马克、卡特福德、穆南和西方其他学者的翻译理论和思想陆续被介绍到国内，以其系统性和科学性打开了中国翻译研究者的视界，我们的翻译研究由此而走上了科学化的探索之路。

20世纪90年代，中国译学研究进入了全面开放的时期，增强了译论引

介的全面性、多样性、系统性和批判性，引介方式由翻译和转述变为评述和阐释，引介重点逐渐由语言学翻译理论转为文化翻译理论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引介中政治考量的色彩越来越淡，理论来源地也从英美扩及德国、法国和低地国家，并开始从宏观层次关注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整体脉络。

进入21世纪后，我们对外国译论的引介呈现出更加动态多样的特点，各学科途径、各流派、各具体研究领域的翻译理论纷纷登场，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食人主义、权力话语、场域等理论概念在翻译研究中层出不穷。

当前，国内外学术交流的信息化程度极大地提高，对外学术交流的渠道更加畅通。我国译学界与国外同仁探讨与交流的前沿性、即时性明显增强，国外的翻译研究成果一经面世，国内即可获得，学界能迅速且系统地把握国际翻译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趋势。同时，国内翻译学术期刊和论著受到外国学者的关注，学术出版机构引进的国外原版翻译理论著作也空前丰富，涉及符号学、人类学、文学理论、哲学、美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各种学科视角，即使在语言学视角之下，也有以认知、功能、关联、话语、语境等不同理论框架探究翻译现象之别。目前国内已有的西方翻译理论资料堪称丰富，学者们对形形色色的西方译论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对外国翻译研究现状了解滞后的情况得到了根本的改观。

对外开放拓展了我国翻译研究的理论视域，引导了研究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拓宽了我们的研究问题域，丰富了研究方法，为翻译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创造了条件。各种学科途径的研究，各种性质的研究包括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预测性研究、解释性研究、评估性研究和行动研究；归纳研究和演绎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等都已为中国翻译学者所熟悉和熟练运用，实证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的文献法、历史法、观察法、比较法、归纳法、调查法、实验法、访谈法和其他技术方法（包括现代信息技术）越来越受到重视，翻译的复杂性被更全面地揭示，翻译研究的科学性愈加凸显。我们的研究不再局限为对翻译实践的技巧总结和翻译原则的抽象归纳，而是由主观思想的概括，走向对具体翻译现象、翻译事件和翻译过程的描写与分析，关注范围不断延伸，由译者主体的经验感受转向所译文本的语言结构，寻找语言转换规

律以及功能再现模式，继而又扩大到对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语境、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等因素的关注，现在又加强了对文本生成过程、译作接受与传播过程、译者心理认知过程、翻译管理过程、翻译政策制定过程等的关注，翻译研究由过去单一范式的研究变成了现今多元范式并存的研究。

简而言之，改革开放开创了我国翻译事业的新局面，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

二、积极探索，加强翻译学的基础建设与理论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见证了我国译学界对具有自身学术品格的翻译理论的不懈探索。从翻译学科理论、翻译基本理论，到译学分支领域的理论和跨学科理论，学者们筚路蓝缕，上下求索。

虽然早至20世纪50年代初董秋斯就发出了建立“翻译学”的声音，但长时间以来翻译研究能否成为一门学科却从未获得理论层面的论证。改革开放之后，翻译研究向科学化发展的同时，翻译学者的学科意识也得到进一步强化。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者们再次旗帜鲜明地呼吁建立翻译学，并开展了一场关于翻译（科）学的大讨论。学者们发表文章提出了各具特色的译学设想，出版了《翻译学》（2000）等多部以“翻译学”为名的专著，讨论了翻译学的学科定位，明确了译学学科性质、功能和理论特征，提出了学科架构，指出了学科分支领域的划分等，为翻译学在中国获得独立的学科身份奠定了理论基础。

过去的40年里，我国翻译学者对翻译的基本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积极探索“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1987）、“翻译层次论”（1987）、“翻译层面论”（1998）、“变译论”（2002）、“翻译的距离论”（2013）等代表性译论，出版了如《文学翻译比较美学》（2000）、《翻译与语言哲学》（2001）、《文学翻译学》（2001）、《翻译论》（2003）、《文化翻译》（2016）、《译学研究叩问录——对当下译论研究的新观察与新思考》（2016）等一批理论专著。学者们对翻译的讨论扩及翻译本体、翻译客体、翻译主体、翻译受众、翻译的社会和文化功能等，既对翻译的语言符号转换、社会话语实践，以及心理思维活动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也致力探究翻译的各种社会文化

影响因素及其矛盾所在,拓展翻译研究的途径,深化对翻译的认识与理解。

过去的40年里,中国学者在翻译的跨学科研究中也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谢天振的译介学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译介学不仅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对象域,更是对翻译研究方法论的创新。王宁在翻译研究与文学研究、跨文化研究的结合方面,发表了丰富的理论著述,并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了“中国声音”。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理论也在批评中不断成长,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以之为理论框架开展有关的专题研究。此外还有“翻译思维学”“翻译美学”“文化翻译学”“翻译认知心理学”“翻译生态学”“翻译地理学”“翻译经济学”“翻译诗学”“翻译社会学”等跨学科翻译研究成果问世。

文学翻译研究方面,学者们从各种角度讨论了文学翻译的基本原理,40年间出版的文学翻译专题的学术著作达320多部,以文学翻译为主题的研究文章达到3万多篇,其中不乏具有特色的理论成果,如许渊冲的“三美”译论,既承继了中国传统译论中的古典美学思想,也革新了人们对翻译忠实的传统认识。从翻译路径来看,汉译外正发展成为我国翻译研究极具自身学术个性的研究领域。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的文学翻译研究越来越重视翻译语对的多样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的翻译史研究也成果颇丰,先后有数十部翻译史著作问世,《西方翻译简史》(1991)、《中国译学理论史稿》(1992)、《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1996)、《翻译文化史论》(1997)、《汉籍外译史》(1998)、《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1999)、《中国科学翻译史》(2000)、《中国口译史》(2002)、《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2004)、《中国翻译通史》(2006)、《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2009)、《中国翻译简史》(2009)、《中国译学史》(2011)等是其中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述不仅证明了翻译有史,而且证明了翻译历史的悠久与宏大,从而为翻译学获得合理的学科身份提供了充分的历史基础,为翻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王宏志、邹振环、赵稀方、屈文生等学者则以深入的个案研究展示了翻译史实的多元面貌,让人们认识到翻译活动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作用。此外,中国翻译研究界还在文学翻译史、法律翻译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出

版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1998）、《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史》（2001）、《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2004）、《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2007）、《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2007）、《中国的英美文学翻译（1929—2008）》（2009）、《从词典出发——法律术语译名统一与规范化的翻译史研究》（2013）等重要著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翻译的路径发生了变化，中国翻译学界也开始注重中国文学外译的历史研究，如用法文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2016）在法国加尼埃经典出版社出版。

在译学探索的过程中，中国翻译学者还及时梳理中国传统译论，总结与展示中国翻译研究的重要成果，出版了《翻译论集》（1984）、《译学新论（1982—1992）》（2003）、《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2002）、《翻译批评研究之路：理论、方法与途径》（2015）等具有学术积累价值的重要论集。

随着翻译行业的兴盛和主流翻译对象的变化，翻译学界对应用翻译研究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科学翻译学》（2004）、《应用翻译学》（2013）、《应用翻译研究》（2015）等是应用翻译研究理论的代表作。在翻译批评研究领域，自1992年最早将翻译批评理论化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问世以来，陆续又有《翻译批评导论》（2005）、《文学翻译批评论稿》（2006）、《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2014）、《翻译批评研究》（2015）等十多部翻译批评理论著作问世，它们推进了我国翻译批评的系统化理论建构。在翻译教育方面，《中国翻译教学研究》（1999）、《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2001）、《翻译教学：理论与实务》（2003）、《我国翻译专业建设：问题与对策》（2007）等十多部专著和万余篇以“翻译教学”为主题的论文对翻译教学与教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

概言之，改革开放以来，译界学者一直弘扬科学的探索精神，不断拓展中国翻译研究领域，深化对翻译基本问题的思考，推进了翻译学各领域的理论建设，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三、多维互动，推进中国翻译与翻译研究事业的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译学界不断解放思想，

突破狭隘的翻译观念，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加强多维互动，既有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国内外的互动，也有跨学科的互动和跨行业的互动。

在中国，翻译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数千年的翻译历史中，翻译活动不断丰富。然而，对翻译的认识，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都限于语言的简单转换这一观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学界积极吸收国外的翻译理论，对中国丰富的翻译实践展开了多层次、多途径的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的研究中提升理论认识，又在理论的指导下，深化对翻译实践的认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翻译在中外交流，尤其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凸显，翻译活动所涉及的一些根本问题得以被认识、被探究、被揭示，这促使人们以超越翻译实践的目光来关注和看待翻译活动，从而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翻译理论建构之途。对翻译本质、翻译价值、翻译的选择与接受、翻译的质量与评价等翻译理论问题的不懈探索，不仅使翻译研究逐步摆脱了被忽视、被轻视的边缘化地位，也为传统的外语学科拓展了研究空间、增加了研究维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下，翻译学者更是自觉地从文化交流的高度来认识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肩负起了维护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文明的互学互鉴、共同丰富与提高的崇高历史使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翻译学界在国内的学术交流和互动日益频繁和深入。1984年开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该会成立于1982年，2005年更名为“中国翻译协会”，均简称“中国译协”）开始举办各类翻译会议。1985年，首届全国中青年文学翻译经验交流会在烟台举行。1987年，首届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和第一次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分别在南京和青岛召开。此后翻译研究方面的学术活动不断开展，规模不断扩大，主题日益集中。我们与国际译学界的直接交流与互动明显增多，学者们积极参加国际译学研讨会，与外国同行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还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出国访学与工作，国际译学名家也频繁地来到中国开设讲座和授课。研究生的国际交流和联合培养趋于正常化，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名字与成果出现在国际翻译学术场域和国际知名出版机构的出版物上，除了发表研究成果和受邀担任国际译学出版物

的编审著作人员之外，中国学者还积极创办国际性译学刊物和研究会。

我们的行业协会、研究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为学科内外的互动提供了必要而充分的条件。中国译协作为翻译领域的全国性社会团体，是译学互动组织者中最重要的一个。1982年成立的中国译协，由与翻译及与翻译工作相关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个人自愿结成。协会的宗旨之一就是开展翻译学术交流、行业交流，以及与国内外相关组织之间的交流。中国译协成立以来，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经常举办翻译行业和学术交流活动，积极组织行业专家和知名学者开展翻译人才培养。已经连续举办了30届的“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竞赛，影响深远，为海内外英汉翻译爱好者提供了译技切磋的平台；1997年开始创办的“暑期全国英汉翻译高级研讨班”成为了高端翻译人才和翻译专业师资培训的国际性示范项目。2017年，中国译协年会在北京召开，吸引了来自中国国家机关、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和智库、高等院校、大型跨国企业、翻译出版机构、外国翻译协会、行业组织及商会等领域700余名代表参加，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中国译协还积极推动翻译行业各项国家标准的制定与实施，积极组织开展与国外译界的合作，于1987年加入国际翻译家联盟，于1995年发起并组织“国际译联亚洲翻译家论坛”系列活动，2008年与国际翻译家联盟在上海共同主办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获得巨大成功，赢得国内外翻译界广泛赞誉。此外，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中国英汉语比较学会以及各省市各层级各类别的翻译协会也开展了大量的学术与行业的互动交流。

2014年，中国翻译研究院成立，这是我国最高规格的以翻译和对外话语体系应用性研究、对外重大翻译项目策划实施和高端翻译人才培养为特色的专业研究机构。它致力于集聚国内外知名翻译家、汉学家、跨文化传播专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以及国际翻译组织专家，研究中国时事政治及经典中国文化翻译中的重大问题，策划实施国家级重大翻译项目，培养多语种高端翻译人才，搭建翻译与国际传播领域的国际化交流合作平台。目前，研究院的多个项目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中国关键词”多语种对外信息传播平台被媒体誉为“让世界读懂中国的支点”；其年度专题报告成为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制定政策和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另外，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

地、沙博理研究中心、许渊冲翻译与比较文化研究院以及其他各类翻译（学）研究机构也举办了丰富多彩的面向汉学家、中国问题研究者、翻译行业人士、翻译学者、翻译教师和翻译学研究生的研讨、研修、培训和实地体验等专题交流活动，有效提升了他们对翻译、翻译研究与中西文化的深度认知。2017年在浙江大学成立的中华译学馆，旨在“传承文化之脉，发挥翻译之用，促进中外交流，拓展思想疆域，驱动思想创新”，计划在三个层面展开积极的工作：在译的层面，推出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社会科学等学科的系列译丛，“译入”与“译出”互动，积极回应国家战略需求，参与国家重要出版工程；在学的层面，就翻译活动所涉及的重大问题展开思考与探索，出版系列翻译研究丛书，举办翻译学术会议；在中外文化交流层面，举办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翻译家论坛，思想家、作家与翻译家对话等，以翻译与文学为核心展开系列活动。

在学术交流互动中，我们的翻译学术期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翻译》《上海翻译》《中国科技翻译》《东方翻译》《语言与翻译》《外语与翻译》《民族翻译》《翻译论坛》《翻译教学与研究》《翻译研究与教学》《译界》《翻译界》等翻译学术期刊和各种外语类专业期刊创设了各具特色的译学栏目，展示、积累、评价和传播研究成果、引领翻译研究方向，促进学科人才培养，为学术交流搭建了重要的平台，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中《中国翻译》连续获评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有力地证明和提升了学科的社会认同度与学术影响力。

多维互动还包括翻译教育发展中的政校行企合作。在职业化的翻译教育和教学探索中，各高校互相学习，同时借鉴国外高校翻译专业的成功办学经验，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和专业课程开发过程中广集学校教师、行业专家和课程专家的智慧，吸引行业人士担任课程教学和实践指导工作，充分发挥政府部门、高校、语言服务行业和翻译企业在翻译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主体作用，共建校内外生产性实训基地、语言服务中心、创业教育实践平台等，以真实的翻译项目驱动翻译教学，促进教学改革，切实提高翻译人才培养质量。

可见，正是由于理论与实践、学科内外、国内外、行业内的多维互动，中国翻译学科和译学研究获得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展现出蓬勃的发展活力。